

日据时期台湾文学评论四阶段简评

马英萍 雷慧英*

近年来,我国大陆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研究发展很快,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通过小说文本分析,揭露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文化造成的伤害。日本学术界也对“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给予了高度关注,由中岛利郎、河源功等人编纂的《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文艺评论集》(以下简称《评论集》)于2001年由日本绿荫书房出版,全书共五卷,收录了日据时期发表在台湾主要杂志的文学文艺评论。本文拟对日据时期台湾文学评论界的主要言论进行大致梳理,旨在阐述台湾文学评论在日本殖民统治与反殖民统治的合力作用下,被扭曲和挣扎的轨迹。从对《评论集》的研究分析看,日据时期的台湾文评界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白话文论争阶段、新文学论争阶段、文学大众化与殖民地文学探讨阶段、批评精神论争与皇民奉公宣扬阶段。

一 白话文论争阶段

自1895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台湾民众多次发起抗日运动,这一时期政治形势不稳定,鲜有文艺杂志发行。直到上世纪20年代初,留日学生创办《台湾青年》(后改为《台湾民报》),初步形成了台湾文学文艺的理论阵地。据《评论集》收录的资料,从1920年到1924年9月关于文学方面的评论共计10余篇,作者都是台湾人,除其中2篇是以日语写作,其余都是用汉语写作。而这一时期的评论主要是探讨文学写作的语言问题。笔者将这一时期视为第一阶段,即白话文论争阶段。在如何解决写作语言的问题上,《台湾青年》杂志的发行人蔡培火提出普及罗马字,以厦门话做为标准用语,以罗马字标注发音^[1]。而其余的多篇文章则主张推广和普及白话文。黄呈聪在《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文中指出:“中国就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未归日本以前是构成中国的一部分,和中国的交通很密接,不论中国有发生什么事情很容易传到台湾,若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母子生活的关系情浓不待我多说,大家的心理上已经明白了。……现在风行全国做文化普及的一种媒介的国文,不论新译外国各种的书,或是新著的书,每日发刊的报纸和每月的杂志,没有不用这种白话文记的,大多数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喜欢读这个容易的文,所以现时中国文化的进行有一日千里之势……”^[2]显然黄呈聪以大陆与台湾的渊源为根据,主张接受大陆进步的文化运动的影响,推广白话文。

日本占领台湾后,台湾文学评论界对于写作语言的探讨并不是偶然。因为写作的语言不仅关系到作者和读者能否很好地沟通,关系到一种报刊杂志能否凝聚固定的读者群,关系到台湾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关系到民族的认同问题。因此,语言问题自然成为日据后的台湾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传统的文言文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白话文写作尚未普及,台语写作面临很多方言有音无字的问题,同时被日语同化的危机日益严重,这就是当时台湾文坛所处的语境,台湾文人对此亦有清醒的认识。黄呈聪指出:“我们台湾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背后没有一个大势力的文字来帮助保存我们的文字,不久便就受他方面有实力的文字来打消我们的文字了,如像我们的社会文化不高,少数人的社会更容易受多数人的社会推倒了。所以不如再加多少的工夫,研究中国的白话文,渐渐接近他,将来就会变做一样,那就不但我们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的地方,就是有心到中国不论做什么事也是很方便,大家若是这样想,就我们的台湾虽是孤岛,也有了大陆的气概了!”^[3]

然而,受到各种殖民政策的影响,特别是日本对台的文化压制,台湾文人呼吁白话文的改革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悬而未决的写作语言问题也一直尴尬着殖民地语境下的台湾文坛。例如在台湾文坛已经鲜有作家用汉语写作的1942年,有日本评论家对当时文坛赫赫有名的张文环、吕赫若两位作家提出批评,毫不客气地指出这两位作家的文章“给读者一种强大魄力的错觉,好像事态很严重一样。这种笔法容易产生反效果。之所

* 马英萍为厦门大学日语系助理教授,文学博士;雷慧英为厦门大学日语系教授。

以很多外地(指日本本土以外的殖民地——笔者注)作家写出的文章都是这种类型,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把日语完全变成自己的东西。我知道针对这一点进行批评有些苛刻,但正因为他们是最有望改正这个缺点的作家,所以我才直言不讳。”^[4]

二 新文学论争阶段

1924年9月张梗在《台湾民报》发表了以《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为题的连载,专门讨论新小说的创造理论。笔者将此视为台湾文学评论界第二个发展阶段的开端。这一阶段延伸至1931年末,主要讨论新文学的创作问题。继张梗发表《讨论旧小说的改革问题》之后,被称为台湾新文化运动之旗手的张我军在《台湾民报》陆续发表《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诗体的解放》、《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章,大力倡导台湾的新文学运动,并在《请合力折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中具体介绍了胡适的新小说创作的“八不主义”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5]

张我军极力主张推翻用于怡情养性的旧文学,呼吁台人以白话文做写实文学和社会文学,引起了当时台湾文学评论界的激烈论争。但是这场论争并没有持续下去,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很多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因积极参加实质性社会政治运动,对抗日本殖民政府的统治,受到总督府的打压。而代表进步思想的杂志也纷纷被迫停刊,导致新文学论争失去了论争的主体和平台。自1926到1931年末,《评论集》所录文章仅有3篇,其中1927年、1929~1931年所录文章数量为0。这个数字背后暗藏着当时台湾文坛进步人士所面临的险恶斗争和令人窒息的社会处境。

笔者认为《评论集》所收1928年唯一一篇评论意义十分重大。该评论发表于1928年3月的《台湾民报》,题为《驳林芙美子的〈台湾风景〉》,作者桃源生,全文是用日语写成。该评论主要针对日本女作家林芙美子发表于1928年3月日本本土的文学刊物《改造》上的游记——《台湾风景》加以批评,一针见血地指出作者是“一只眼睛看台湾”,只看到大稻埕的肮脏落后,全篇游记只会令内地(指日本本土)人“提起台湾就联想起散发着韭菜臭味的、肥胖的本岛人”,加深了“内地人”对台湾的偏见、歧视和反感,所谓的“内台融合”、“民族和合”不过是句空话。此外,桃源生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十分尖锐地指出游记作者“用尽所有丑恶的词语形容(台湾)”,却没有“进一步分析为什么会这么丑陋”,并指出“(作者)如果揭露台湾的殖民政策,或许可以写出和小林多喜二不相上下的很棒的无产阶级文学。”^[6]

桃源生的这篇评论直击日本殖民统治。他不但指出台湾的丑陋与落后的根源在于日本的殖民政策,而且深刻揭露了游记作者所代表的殖民地宗主国的价值观。在后殖民理论炙手可热的今天,我们知道欧洲中心主义正是以“文明—野蛮”、“先进—落后”、“理性—非理性”等一系列二元论来衡量世界,并对殖民地国家加以“妖魔化”,从而掌控对殖民地国家的话语权。而在上世纪20年代,在桃源生亲历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之时,他能够跳出时局,敏锐地抓住社会矛盾,并敢于发表如此激进的言论,十分难得。可以说这篇颇具后殖民理论色彩的评论即使在今天仍不失为一篇优秀的文评。

三 文学大众化与殖民地文学探讨阶段

由于受到台湾总督府的打压和日本新闻检查制度的迫害,台湾文坛经过了一段相对萧条的时期。1932年后,随着《南音》杂志创刊、《台湾新民报》从周刊改为日刊,文学作品的发表数量逐渐增多。在随后的1933、1934年《福尔摩沙》和《先发部队》相继创刊,台湾文坛渐渐复苏。从《评论集》所收评论来看,1932年至1937年间文学评论界讨论的课题多样,文艺时评发表频繁,是台湾文学评论界稳定发展的一段时期。

这一时期台湾文学评论界集中讨论的首个热点问题是台湾话文的建设问题。学界一般认为这是台湾文坛继“新旧文学”论争之后的第二场大论争。笔者认为这场论争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对一直悬而未决的写作语言问题的再提起。1932年1月创刊的《南音》杂志专门开辟了《台湾话文讨论栏》,庄遂性、郭秋生、黄石辉等人在此展开激烈讨论。其中庄遂性(笔名“负人”)在连载五次的《台湾话文杂驳》中反驳了朱点人的“以中国话文为主,台湾话文为从”的主张,并采用语言学家朱我农的观点,认为“无论哪一种语言、文字,只有因

为文字不合语言,把文字改了的。断没有用文字去改语言的。”“文字是随着语言进化的……语言渐渐统一,文字也就统一了”。庄遂性主张用汉字取义写台湾话,进而建设和推广“台湾话的文学”,同时为中国国语文的大成“尽其方言的使命”。^[7]另外,郭秋生、赖和、黄石辉等人多次在《台湾话文讨论栏》发表文章,讨论台湾话文的新字问题,为台湾话文建设提出了具体意见。

尽管台湾文人对建设台湾话文学抱有很多美好的构想,但台湾的白话文却没有像中国大陆的白话文一样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从《评论集》所录文章数量来看,自1933年以后,日文评论的数量已经明显多于汉文评论,作者既有台湾人也有日本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台湾话文的建设过程中,由于殖民政策的影响,日文开始显露强势并最终阻断了台湾话文的正常发展。正如杨逵在1935年回顾台湾的文学运动时所分析的那样:“台湾人作家究竟应该用哪种语言写作?台湾的语言问题对每一位文学爱好者来说是最根本的问题,也是文学殖民地的一大困惑。……原来台湾居民几乎全部是汉族,文学上也从属于大陆,但自划归日本帝国以后,汉文教育逐渐被禁止,在初等中等教育中强制使用日语,产生了语言上的畸形儿。”^[8]

在《南音》杂志上关于台湾话文的讨论如火如荼的同时,有些进步的日本文人开始提出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并向台湾宣传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例如,1932年6月《台湾文学》^[9]的卷首语言辞相当激进,以至于不得不在多处使用伏字来躲避日本殖民政府严酷的新闻检查制度。这篇题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的卷首语写道:“台湾文学现在亟待进行严格的自我清算和自我批判。……所谓严格的自我清算和自我批判是什么呢?这意味着清算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xxxx(原文为9个日文伏字——笔者注)原则上(现在我们要特别强调原则上)即xxxx(原文为11个日文伏字——笔者注)。在面临如何转化和非这样不可吗的问题上,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原则到战略都会露出马脚。被用作形容词的‘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意味着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身为知识分子,我们既不能高傲自大,也不能妄自菲薄,我们现在必须正确理解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只有这样,台湾文学才能向大众更好地显示她本来的使命。”^[10]

同期的《台湾文学》还刊登了题为《台湾文学运动的主导权、目标、组织——以大众化为中心确立文学的党派性》的文章。作者秋本真一郎在文中大力宣扬马克思、列宁的文学理论,主张把台湾的无产阶级文学推向大众。秋本将台湾的殖民地问题作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并指出“所谓台湾的独特文学,即台湾的殖民地特质。……必须创造大众化的真正的殖民地文学(台湾文学),强大的、坚韧的、战斗的、xx的殖民地文学。”此外,秋本还指出了台湾文学大众化的具体目标,但由于此处原文较多伏字和删除,我们只能通过上下文推断目标可能指糖业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秋本强调:“只有有了决定性的目标(更根本的是政治目标,其他的一切都由此派生出来。但是协会应该先将所有事物具体地展示给关心文艺的全体大众),才可能进行有组织的创作。”进而,秋本指出文学创作活动应排除无政府主义,应在明确的方针指导下,有组织地进行。^[11]

发表在《台湾文学》(只出刊6期便遭停刊厄运)上的这几篇评论都颇有分量。尽管大陆学界对此鲜有人论及,但其确为当时的台湾文学指出了具体的方向和做法。笔者认为这几篇评论的出现并非偶然,它和日本上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的无产阶级文学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它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向台湾溢出的支流。受此影响,张深切、郭秋生、杨逵等人在《台湾文艺》(1934年11月创刊)上发表文章,讨论文艺大众化的问题。1934年凭借小说《送报夫》获日本本土进步杂志《文学评论》二等奖(一等奖为空缺)的杨逵,在《艺术是大众的》一文中说:“真正欣赏艺术的是大众,仅有少数人能理解的不是艺术!”^[12]在《文艺批评的基准》中说:“我们在创作时,一定要以读者大众为对象,对牛弹琴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评定作品好坏的标准,在于读者大众的反应。”^[13]在《排除高雅的艺术观》一文中,杨逵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14]

有些左翼文人将建设殖民地文学作为文学大众化的必经之路。由杨逵创办的《台湾新文学》杂志自创刊之初就将建设殖民地文学作为台湾新文学的应进之路加以探讨。1935年12月,《台湾新文学》创刊号以“对台湾新文学的期待”为题,就“殖民地文学的应进之路”广泛征集作家、评论家的意见。投稿者多为日本本土文人,而且有些意见相当激进。日本左翼作家平林泰子指出:“殖民地作家的活动在日本仍很不充分。当然,必须用日语写作会给作家的活动带来不便,但我认为应该出现更多作家。比如朝鲜出身的张赫宙,他的作家素质和开阔的人生观都凌驾于日本人之上,但对殖民地朝鲜的认识却有安于现状——或有顾忌或犹豫之处,我对这点有些不满。如果从正面硬碰硬,也许会有检阅制度的麻烦,但在广阔的文学世界,提出问题的方法千变万化,我想会有很多躲避的方法。”^[15]另一位日本作家细田民树则指出:“现在是一个非文化时代,就连在日本内地言论自由也受到极端的压制,更不用说殖民地。在这样一个时代,如果殖民地文学要装作盛况空前或做出

怒吼,不仅不会有文化效果,还会立刻受到压制而无法动弹。从过去日本文化运动的失败就可以一目了然。因此,现阶段殖民地文学的第一项任务就是用正确的方法,冷静详细地描写殖民地现状。……我们应该正确理解现实主义,各位的文学应该涉及殖民地的现实。”^[16]平林和细田两人分别提出了殖民地文学所应具有的斗争姿态和斗争策略。由此可见,日本的无产阶级作家为台湾的殖民地文学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四 批评精神论争与皇民奉公宣扬阶段

“七七事变”以后,台湾进入战时体制,总督府全力推行“皇民化”运动。在文学方面,左翼文学的代表杨逵几乎退出文坛,而殖民政府的拥护者日本文人西川满、滨田准雄等人却表现活跃。文学评论无论从数量还是话语权上看,台湾本岛人都明显处于弱势。日本评论家涩谷精一在《关于文艺批评》一文中批评台湾整体文化水平低,台湾的批评家和本土一流的批评家相差甚远。并指出本岛批评家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没有主见。他以龙瑛宗的《南方的作家们》为例,指出龙瑛宗的评论没有一定的标准,毫无主见,既称赞滨田的《南方移民村》是“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建设性文学”,又赞赏西川满文学的“浪漫”,既夸奖新垣宏一具有鲜明的作家精神,又肯定川河三良有才能……涩谷在文章的最后说:“我们是薄弱的,但即使薄弱我们也必须有坚定的信念,敢于批评。要宁渴不饮盗泉之水。”^[17]涩谷的评论并非没有道理,但是笔者认为龙瑛宗的“软弱”和“没有主见”只是一个表象,更深层次的事实是他作为本岛作家,在话语权上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是无法和日本本土作家平等的,更不可能严厉指出日本本土作家在创作上的不足之处。

尽管日本作为殖民地宗主国,在文化上处于霸权地位,但仍有一部分台湾人以自己的方式对这种霸权进行解构。例如日本作家庄司总一的长篇小说《陈夫人》,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部小说是日本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18],但这部小说在当时文坛获得很高评价,甚至于1943年获得大东亚文学奖。滨田准雄在《台湾时报》上对这部小说大加赞赏,称:“既然皇民奉公运动是一种文化启蒙运动,要在正确把握本岛人生活心理的基础上以自然的方式进行,那么政府官员一定要读一读像《陈夫人》这样对政策有诸多启发的小说。”^[19]

但是,作为台湾本岛人,田子浩对这部小说的评论明显和当时的主流话语相左。田子浩的批评包括小说中出现的台湾语音错误,人物心理描写的矛盾等,特别是他对小说中描述的台湾本岛人习俗提出了8条反驳意见。例如,小说中提到的“本岛人最爱打官司,父子、夫妇之间互告的例子也时可见到。”对于这一点,田子浩反驳说:“本岛人并不爱打官司,那是近代思想的混乱波及到日渐崩溃的家族思想后产生的现象。本岛人一直在生活中维持大家族制度,……力求消除利害保持和谐。……受到个人主义近代思想的影响,本岛现在处于思想混乱、堕落的时期。”^[20]在对小说中不客观的描述做出逐条反驳之后,田子浩总结说:“正如作者所说,风俗习惯和个性的好坏是一个程度问题,尺度经常是相对的。有些现象是特定的,有些是普遍性的。本岛人的风俗习惯中也有我们看来非常不好,但内地人不以为然的。正像我们虽不欣赏内地人的风俗习惯,但内地人觉得很好,很优雅一样。内地人有些风俗和个性非常优雅,同样,本岛人的风俗和个性中也有内地人所不了解的优雅别致之处。”^[21]田子浩的批评非常具体,他通过对小说细节的把握挖掘出作者深层次意识形态的问题,是一篇很有见地的文评。笔者认为在1941年台湾总督府全面推行“皇民奉公”,要求台湾人生活习俗“内地化”的特定语境下,田子浩的这篇评论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化霸权起到了一定的解构作用。

1942年后,配合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制定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国策纲要”,日本文学报国会主办了3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台湾文人张文环、龙瑛宗以外地代表作家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大会。建立大东亚文学的共存共荣,文学应配合“圣战”的言论充斥着评论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包括早年左翼文学的代表杨逵在内,许多文人对建设所谓的大东亚文学都抱有期待。1943年11月,台湾文学奉公会召开了所谓的台湾决战文学会议,会议发言的内容基本上是鼓吹所谓的皇民文学和大和魂,^[22]而这些内容被登载在右翼杂志《文艺台湾》的终刊号上,颇具象征意义。

结 语

文学评论对文学创作起着指导、总结、反省和展望的作用。通过对《评论集》的研究,笔者发现日据时期

的台湾文学评论界集合了各种势力,其中有中国大陆对台湾文学的影响,有台湾对大陆文化的依恋和向往,有日本殖民政府对台湾文化的控制,有台湾对殖民地宗主国霸权话语的妥协和反拨,有日本进步人士对台湾殖民地文学的刺激和激励等等。可以说台湾文学正是在这些纵横交错力的作用下,一面寻找着自我身份认同一面发展起来的。《评论集》提供给我们非常大的信息量,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能做管中窥豹式的探讨。这方面的研究空间还很大,今后将继续开发。

注释:

[1][2][3][5][6][7][10][11] 中岛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编:《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文艺评论集》第一卷,日本绿荫书房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 52-56 页、第 26-27 页、第 29-30 页、第 73-75 页、第 107-108 页、第 124-127 页、第 189-190 页、参见第 191-196 页。

[4][17] 中岛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编:《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文艺评论集》第四卷,日本绿荫书房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 230 页、参见第 109-114 页。

[8][12][13][14][15][16] 中岛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编:《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文艺评论集》第二卷,日本绿荫书房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 199 页、第 21 页、第 130 页、第 149-150 页、第 218 页、第 218-219 页。

[9] 指 1931 年 9 月由别所孝二于台北创刊的《台湾文学》,共出刊 6 期,遭查禁 2 期。

[18] 参见朱双一、刘红:《日本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日据后期在台日本作家长篇小说析论》,《台湾研究集刊》2005 年第 4 期。

[19][20][21] 中岛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编:《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文艺评论集》第三卷,日本绿荫书房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 347 页、第 402-403 页、第 404 页。

[22] 参见中岛利郎、河原功、下村作次郎编:《日本统治期台湾文学文艺评论集》第五卷,日本绿荫书房出版社 2001 年第 1 版,第 217-245 页。

(责任编辑 毛仲伟)

(上接第 32 页)

敢跨越红线,但应当承认,陈水扁执政八年,在塑造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方面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如今,与“台独意识”只有一步之遥的所谓“台湾主体意识”,已经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尽管已经成为在野党,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掌握着台湾岛内的“话语权”,这是需要认真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

由上可知,“台独意识”和“台湾主体意识”的发生发展,的确与台湾政治结构的演变息息相关。在这个过程中,李登辉、陈水扁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但这也说明,随着台湾政治环境的逐步正常化,以及两岸关系的不断改善,台湾民众以中华民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也是可以重新塑造的。2010 年 3 月《远见》杂志的一份民调表明,认同自己属于中华民族一分子的台湾民众,比率达到 79.6%,这是一个积极的现象。事实说明,台湾民众的民族国家认同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任何悲观失望或无所作为的观点,都是缺乏根据的。

注释:

[1] 连横:《台湾通史·独立纪》,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70 页。

[2] 白纯:《简析抗战时期的台湾调查委员会》,《江海学刊》2005 年第 1 期。

[3] (日)若林正文:《分裂国家与民主化》,台湾月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8 页。

(责任编辑 毛仲伟)